

中国典籍在海外

《农政全书》 为世界带去中国农业技术

□ 陈思远 何明星

中国是农业大国，历代对农业典籍编撰和刻印的重视，使之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知识的生产和传承体系。

《农政全书》成书于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前后，全书共60卷，50余万字，作者徐光启是政治家兼农学家、数学家。他曾在家乡进行甘薯引种和薯种收藏越冬试验，上《甘薯疏》。在他的努力下，甘薯在大江南北广泛种植，成为中国重要粮食作物。他还写过《种棉花法》等农业著作。后人评论《农政全书》：“其书本未成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于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这部百科全书式图书不仅在屯垦、救荒、水利、栽培、蚕桑、农器等多方面总结中国古代农业技术，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农本”（农业是国家之本）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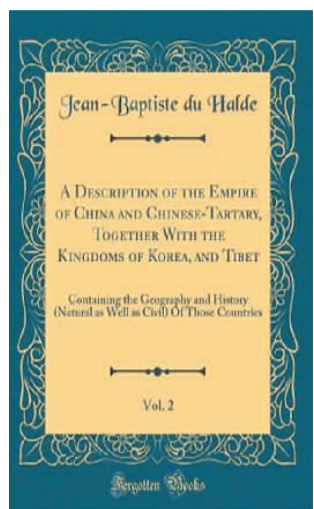
徐光启辞世两年后，其门生陈子龙从徐光启孙手中借得《农政全书》书稿并完整抄录。1639年，学者陈子龙等人校对、编辑之后交付梓刻，是为《农政全书》的首个刻本即“平露堂刊本”。清代共出现6种《农政全书》刻本。

在成书后数百年间，《农政全书》被外国传教士和农学家翻译、引介，深刻影响了海外国家的农书创作、农业生产乃至农业制度变革，成为中外农业跨文化交流的突出象征。

影响日本、朝鲜农业发展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历史上，日本和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保持着紧密的农业技术交流。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早在宽平年间（889-897年）就已传入日本。

17世纪初，中国海禁政策放宽，大批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港贸易，《农政全书》被引入日本。1666年，《农政全书》作为参考文献在日本学者中村搦斋的《训蒙图记》中出现。之后，以大阪、京都和江户为中心的大城市群开始出现，加剧了对农



【法】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2018年10月出版（内含《农政全书》蚕桑篇）

产品的需求，提高农业生产力成为当务之急。《农政全书》的引入，也推动了日本本土农书创作的繁荣。

1697年由日本农学家官崎安贞编撰出版的《农业全书》，因大量参考《农政全书》，被日本学界称为《农政全书》的“精炼日本版”。它继承了“农本”思想，但与《农政全书》“以农为政”（以农业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不同，更强调“以农为业”，即把农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

除《农业全书》，日本的《农业要集》《耕稼春秋》《农业蒙训》等农书都受到了《农政全书》的影响，这些农书不仅推动了日本农业技术的提高和普及，还促进了日本农业的商品化发展和农民经济地位的提高。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一直保持着藩属关系。李朝政府为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和方法，积极译介中国农书，其中就包括《农政全书》。李朝实学家朴趾源针对中国农书提出：“有心人可取而细考焉，则吾东生民贫瘠欲死，庶几有存耳。”李朝后期，朝鲜发生大规模饥荒，李朝官员徐有渠设法将甘薯引入朝鲜种植，他将《农政全书》内容结合朝鲜实际，编撰了《种薯谱》一书。此外，徐有渠编撰

的农学巨著《林园经济十六志》也大量征引《农政全书》的内容。

可见，《农政全书》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鲜的农业状况，促进了朝鲜的农书创作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

桑棉内容深受欧洲重视

《农政全书》在欧洲的传播主要靠传教士、汉学家和科学家所推动。

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曾掀起一股由来华传教士引发的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热”，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在欧洲翻译出版，《农政全书》也被引入了欧洲。1735年，法国巴黎的耶稣会传教士杜赫德根据在华27名传教士收集的相关信息编撰了系统介绍中国情况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在第二卷中收录了由传教士殷弘绪翻译的《农政全书》第31-39卷的《蚕桑》篇，殷弘绪将该篇标题译为《一部教人更多更好地养蚕方法的中国古书之摘要》，向欧洲全面介绍中国的蚕桑技术。

法国重农学派以《农政全书》为标榜，在政经领域大力推广重农思想。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专门著书介绍中国农业制度，并认为只有农业能增加财富，起到抑制货币和商业资本的作用。

1777年，《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俄文在圣彼得堡出版，时值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推行经济改革，中国先进的蚕桑和植棉技术在俄国得到全面推广，推动了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19世纪后，欧洲对《农政全书》的翻译趋向精准化，以服务于当时的农事生产和农学研究。1849年，英国汉学家、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将《农政全书》的《蚕桑》篇再次译为英文并题为《制丝裁桑概论》，并将其作为单行本在上海发行。1864年，英国人肖氏将《农政全书》第35卷《木棉》篇关于种植棉花的部分译成英文，题为《上海地区植棉概论》发表在《中国丛报》第18卷第9期上。肖氏称《农政全书》为“中国

农业的百科全书”。1865年，俄国人安东尼将《农政全书》和《农桑辑要》两部书中关于蚕桑的部分翻译成俄文，题为《论中国人的养蚕术》，刊发于《俄国昆虫学会会报》第3卷第1期。意大利人安德烈奥奇将《农政全书》的《荒政》篇中的“玄庵先生除蝗疏”一文译为意大利文，题为《论蝗虫之农政全书论述提要》，1870年以单行本发于米兰，为西方治理蝗灾提供了借鉴。

进入20世纪，《农政全书》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依然为欧洲学者所关注。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将《农政全书》誉为“一部农业方面的卓越巨著”，并将其收录进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与生物技术》的第2册《农业》中，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白馥兰教授首次用英语较全面地介绍了《农政全书》，并详细分析了其成书过程和文献价值。

《农政全书》在欧洲获得了高度评价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称赞说：“中国农业是以经验和观察为指导，长期保持着土壤肥力，借以适应人口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其产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农业耕种方法。”

据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馆藏数据库WorldCat的数据统计，美、英、澳、德40多家海外图书馆收藏了《农政全书》的历代刻本和现代版本。

欧洲积极翻译中国农书，引进中国先进农业技术，不仅改变了18世纪欧洲农业生产落后的局面，也间接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

此外，《农政全书》中蕴含的“农政”思想在当下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农政”思想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反思和检讨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大工业生产范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资源危机、气候危机，也启示我们应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商务推出

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 本报记者 张雅丹 文图

“1958年出版社业务分工，学术出版成为商务（商务印书馆）主要方向。历史上，商务开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先河，曾邀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风靡一时。目前，文学翻译出版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而且范畴较狭窄，只盯着经典中的畅销书，所以商务应该做些事儿。”10月24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第一辑）出版座谈会上，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开宗明义，谈及丛书的缘起。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40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第一辑）30本，按体裁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传记五个门类，以封面颜色区分。有《培根随笔全集》《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鼠疫》《局外人》等外国文学经典，也有偏冷门的《托尔梅斯河的拉撒路》《孤寂深渊》。

从顾青讲到的出版主旨看，这套丛书显然是准备下一盘大棋。顾青认为，世界文学史上值得译介的外国文学名著有上千种，目前大部分尚在遗珠之列，为国人所不知。商务印书馆不参与对排名前100的外国文学畅销经典进行的内卷性竞争，而是准备扎实肯綮、打硬仗——只要是文学史上确有定评的经典，不论所属国家、语言、不论体裁，皆在收录之列；只要译笔精当，不问译者背景、资历、年龄；不论需要何种付出，不管做50年还是100年，力求成就一套完整呈现世界文学经典全貌的汉译精品丛书。

这个富有使命感的规划令人振奋。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等高校和机构的与会外国文学专家和译者祝贺之余，纷纷为丛书出谋划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赵振江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学是各国人民相互了解沟通的桥梁。商务印书馆此次出版“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视野开阔，志存高远，诸体皆收，名作无遗，必将大有作为。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将来有必要考虑以语种分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文飞表示，各语种都有自己鲜明的语言传统和翻译风格，分野明显。北京大学教授、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谷裕认为，德语著作内容皆与思想、文化、历史相关，有强烈的语种特征，必须加以注释才方便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

关于丛书的书目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世界文学》前主编余中先以法国的《理想藏书》不断淘旧纳新为例，提出丛书可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同时要有序引进年轻一代译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表示，翻译具



中场休息，与会专家学者围着丛书第一辑热烈交谈。

有思想性才有传世价值，要符合当代社会的语言文化心理，强调图书的教育价值，常翻常新。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认为，丛书不能放弃对现代的思考，要针对现代读者进行经典重组，输入新的理念，体现出40年来的提高和变化。译者会受到时代的限制，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翻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意语系主任范晖则建议，可以围绕丛书的不断推进建立一个平台，召开形式多样的小规模座谈会，以问题为导向，探讨信达雅的现代界定、译名的纠结（神父还是神甫）、语种板块、跨语种的流浪汉小说、翻译与国内创作的文学比较研究等。



用凝视解锁艺术

□ 王啸雷

的变量，只有情感加诸其上才会生发奇妙的反应。艺术家将自身对世界的体悟凝练在作品中，等待观者用目光将其点亮。艺术作品宛如一扇扇悬置在时空中的窗户，我们在窗外凝视作品，作品也在窗内温柔对望作品外的世界。这像极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袁枚诗），目光对视的一瞬，便打开了一个诗意的艺术审美空间。

《女神芙罗拉》左手持花篮，右脚踏地，侧身右转采花，左脚尖轻点地面，她的背影由此显得如此修长而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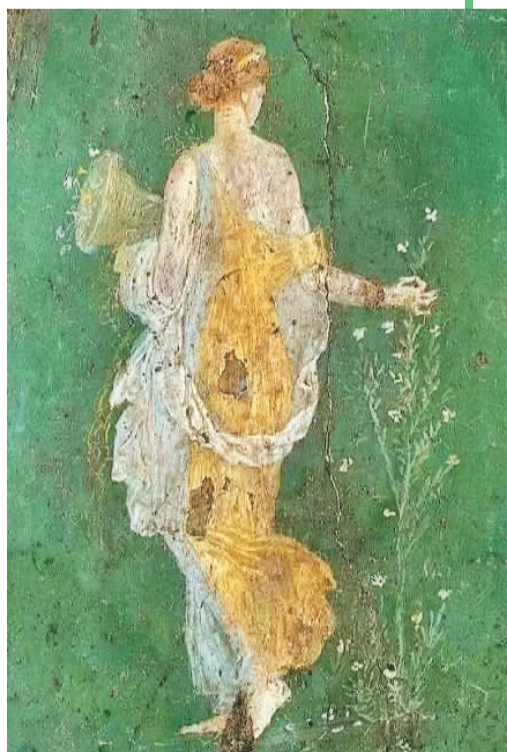
近30年来，介绍西方艺术的著作持续增加，书籍定调也从正襟危坐的艺术通史和学术专著，到艺术从业者的专业阐述和感悟，再到非专业作家或活泼或戏谑的解读。

陆绍阳的《看画小记》，就是对多年来寓目作品的一次巡礼和致敬。我们常说，美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作者告诉我们，要打开的，不只是寻找美的眼睛，更是自我心灵的性灵之窗。用性灵的目光与艺术乃至整个世界深情对望，心灵会充盈，生命会沸腾。

凝视是视觉艺术的本质。观看一件艺术品或一个图像要多长时间？匆匆一瞥，还是对着它痴呆呆坐上一整天？时间是个无常

艺术少有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又何尝不首先是个有血有肉有灵、生命力充沛、活生生的生命体？

观看艺术，乃至通过艺术回望生活，更需要我们心眼相通的态度和方式。而这一切，与其说是训练，毋宁说始于一种最纯粹最坦率的性灵的目光。



《女神芙罗拉》

我看诺奖中的移民文学

□ 林颀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这位冷门作家？

颁奖词说：“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影响以及文化和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选择他，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对移民文学的关注。

古尔纳来自坦桑尼亚，目前是居住在英国用英语写作的作家，还是英国肯特大学的教授。换句话说，古尔纳是一位移民作家。2001年获奖的V.S.奈保尔、2017年获奖的石黑一雄，都是移民作家。

评论家张峰写了篇文章，标题《游走中心和边缘之间：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的流散》，点明了移民作家身上共同的特点：那种游走的、不安的流散感。

移民状态本身，就把知识分子置入了一种与文化矛盾的关系——永远不完全适应、永远觉得外在于土著的、闲聊的、熟悉的世界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将移民作家悬置，使得他们不可能回到某个先前的、也许更加稳定的在家感觉。为了获得这种在家感觉，华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

几乎完全消除了早年的俄国痕迹，变成一位相当有美国味儿的作家。

到了奈保尔、石黑一雄、古尔纳等人，“流亡”变成了“流散”，词语的情感维度的下降，意味着这批移民作家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他们依然游走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只是程度与感受有所减轻。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认为：“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中，一切都在变化——记忆、名字、身份。这可能是因为他创作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都无法完成，在他所有

的作品中都呈现出一种由智者的热情驱动的永无止境的探索。”

记忆、名字、身份，几乎是所有移民作家不断书写的主题。米兰·昆德拉形容，移民作家就像杂技演员一般，走在两种语言之间拉紧的绳索上，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身份。什么时候他最是他自己？是用自己最初所讲的语言，还是用他的东道主的语言进行自我表达时？

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作家莱莉亚·克里斯蒂娃讲述了徘徊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撕裂感，这种被克里斯蒂娃描绘为痛苦和异化的感觉，用一个文化概念来解释，就是“他者”。这个概念涉及社会身份塑造和主体地位的关联。

这个概念可以回溯到黑格尔那里。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他者的承认，人类的意识就不可能认识到自身。就此来说，“流散”就是全人类普遍具有的情感特征，我们每个人都正在寻找自己的故乡家园。

全球化的今天，流动在加速，移民文学或者会更加广泛地出现。而现代性问题是更大的话题，我们先就此打住吧。

重阳登高讲“谱系” 村民尝鲜数字读

本报电（张颖慧）10月14日，正值重阳佳节，宜登高怀古。在北京房山区大安山乡眺煤涧村里，一场名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主题讲座正在进行，房山区党建智库专家、高级政工师杨树德从时代精神开始，追溯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和伟大精神，用鲜活事例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疫精神等。在场村民认真聆听讲座，与专家进行互动，分享自己的

见解，现场氛围热烈。这是北京阅读季·阅读驿站举办的“重阳思古，传承红色基因”阅读活动。

讲座结束后，村民们到流动书车前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不时相互交流着书中的内容。今年北京阅读季还数字阅读墙墙进了乡村，了解到使用方法后，

村民们纷纷拿出手机，扫码收听有声书，阅读电子书，开始尝试数字阅读。不少村民表示：这种方式非常好，年纪大了，阅读文字不是很方便，收听有声书，可以让自己随时随地“听”名著。



村民扫码喜欢的电子书